

1807



天津市文史資料

(三)



津市文史资料

第三辑

711/23/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津市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目 录

马日事变后我来津市工作一百天·····	(1)
贺龙镇守使在津市·····	(3)
北伐前贺龙在澧洲的军事行动·····	(18)
贺龙镇守使办教育二、三事·····	(23)
红军在津市印制“战斗条令”的情况·····	(27)
一九三〇年红军两次攻打津澧·····	(29)
中国远征军同日军作战纪事·····	(41)
我对组建澧县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的回顾·····	(60)
忆中共津市新华工厂支部地下宣传工作·····	(63)
津市工商界的“迎解”活动·····	(71)
抗战时期湖南学生干部大队活动纪实·····	(75)
回忆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前后·····	(80)
记日伪统治时期的“津市维持会”·····	(88)
旧社会津市禁烟花招·····	(93)
解放前津市警察机构的设置和演变·····	(96)
旧社会津市夹街妓院·····	(102)
津市盐务史·····	(106)
津市长津轮驳公司·····	(121)
津市历史上的水患与水灾·····	(124)
津市私立明道中学办学补述·····	(131)
回忆津市澹津女校·····	(136)
张思泉与“镇大美孚煤油公司”·····	(140)
名艺人彭化万·····	(145)

马日事变后我来津市工作一百天

蹇 先 任

一九二六年秋，我在慈利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我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做学生工作时转入共产党。“马日事变”后，长沙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当局高喊“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人”。在这种血腥镇压下，许多同志被捕入狱，惨遭杀害。当时我怀着万分悲愤的心情，根据党的指示，由长沙转到津市，计划隐蔽下来。我到津市后，住在刘公桥的合记布庄。这个布庄的老板同我父亲是表兄弟。住了几天，老板见我经常外出活动，就劝我回家去，避免风险。我看他有些害怕，就离开了合记布庄。又通过父亲其他的 关系，请了铺保，进入津市九澧平民工厂当女工，以便寻找当地党的组织，继续开展工作。

有次在津市的某船上，我发现有人在看较进步的书籍，就打手势问是不是“C”。他若回答手势是“C”，就是我们的同志。用这种方式，我在津市找到了一个姓张的青年，年纪二十多岁，象个学生。由这位姓张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姓陈的，工人打扮，有四十多岁，他们都是党员。我是当年七月中旬到平民工厂的，十月上旬离开，呆了三个月。这期间我没有找到党，但我在工厂与青年女工都很接近，从中挑选可靠而又忠实的，用结拜姊妹方法，向她们宣传妇女要与男子平等 课题着手；再谈到共产党，共青团都是好人；揭露反动统治者杀害学生、工人、农民和青年的罪恶，激发她们的同情。慈利溪口人王菊

秀，时年十七岁，是平民工厂女工，整日与我在一起，感情很好，她提出要找共产党，表示愿意参加。由她又联系一孤儿，名丁玉珍，二十余岁，澧县刘家河人。我同她们联系很紧，准备找到织组后发展为党员。十月上旬，袁任远给我寄来一封信，要我在平民工厂长期隐蔽。他化名是“慕莲”。这时，该厂厂长聂左泉同袁任远是同乡，认识他的笔迹。他看到这封信后就拆信检查，并对我百般盘诘，还扬言送军警究办。为了不落敌手，在陈、张两同志的帮助下，我逃出了平民工厂，转移到石门，找到袁任远，接上了组织关系。

一九二九年我参加红军，同贺龙谈到聂左泉的问题。贺龙告诉我：聂左泉是贺龙的原副官长，思想反动。一九二六年贺龙同周逸群同志接触后，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准备挥师北伐，聂左泉不干了，向贺龙要求弃军从工。贺龙让他在津市平民工厂当厂长。我在平民工厂作工时，张一鸣同志也说他很坏。聂左泉在厂里不仅残酷压迫工人，吸吮血汗，侮辱女工，而且在政治上很反动，常在工人中散布反共言论，监视工人言行，经常突击检查工人行李和工人来往信件，发现是嫌疑者即送军警机关，当政治犯惩办。记得八一南昌起义暴发后，他大骂共产党，污蔑贺龙同志，经常集合工人训话，恶狠狠地向工人宣布：“共产党休想在本工厂播种埋根”。后来我在石门工作时，听说聂左泉在一九二八年初因事赴长，受同僚诬告，被国民党在长沙枪毙，幸好除掉了在平民工厂的一大祸害。

李林森整理

贺龙镇守使在津市

田 培 森

贺龙同志对津市是相当熟悉的：在青少年时代，为生活计，频繁地往来于津市；任澧州镇守使时期，常住在津市；北伐战争爆发后，曾率领部队在津市驻足饮马；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又两度统帅红军指战员攻占津市……。贺龙同志对津市有着深厚的乡土感情和革命情谊，他常常眷念地说：“津澧是我的第二故乡”。至今健在的老人，常津津乐道地谈起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任澧州镇守使时在津市的业绩。

奇袭津市 智取澧州

继二年前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一九二四年九月，北方又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十月，直系将领冯玉祥火线反叛，率兵返回北京发动政变，将其部队改称“国民军”。为了对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形势的发展，对南方革命政府极为有利，孙中山当即命令在四川和直系军阀作战的熊克武部改为“建国联军”，经湘西，出师北上。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旬，熊克武率队劈关夺隘，由沅陵打到了常德，立即召集所属川、黔、湘各部将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上，并命令其部下第九混成旅旅长贺龙，执先锋印进占津市、澧州，把矛头直指唐荣阳，进而控制

澧水流域各县。

唐荣阳，人称“活阎王”，在任澧州镇守使和常德镇守使期间，不理政事，整天追求吃喝玩乐，肆意挥霍。他动员民工大兴土木，修建专供他用的公馆、花园。从常德雇来大舞台坤班，在钰署演剧三日，是因他升任了常德镇守使。时隔几天，大做特做“四十七岁”寿辰，长沙一家报纸报道：“省垣赴澧观寿者何多，需民船七只装运”。其排场之大，耗费之巨的狂欢场面，便无需赘言了。

按照旧律，他一个镇守使每年又有多少俸薪呢？但花的钱，象澧水河的水长流不止，他的享乐是建筑在劳苦大众痛苦之上的。唐荣阳横征暴敛，贪得无厌，仅三、四年间，除了花天酒地的浩繁开支外，还积蓄了数百万元光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津、澧人民对“活阎王”唐荣阳恨之入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三下午，扣押在澧县县署的四十余名犯人，趁看守人午餐不备之机，蜂拥劈门而去。仅这样三、五成群、零打碎敲的斗争与反抗，当然不可能动摇唐荣阳这个“土皇帝”的宝座。贺龙在常德接待了很多家乡父老兄弟，决心俯顺民意，赶走唐荣阳。

前不久，唐荣阳为了阻止“建国联军”北上，在桃源县与熊克武、贺龙所部打了一仗，损兵折将吃了大亏。当探听到贺龙要进军津、澧时，他慌慌忙忙在津、澧一带布下重兵，妄图以逸代劳，以优势兵力击退贺龙，保住他的老巢。但是，贺龙对津澧一带地形了如指掌，针对澧州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的特点，制定了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先派大部队由常德沿临澧浩浩荡荡地向澧州运动。待唐荣阳将驻防津市的兵力撤到澧州至临澧一线时，贺龙却密派王育瑛团绕到澧州东南，经新洲、窑坡，从澧水南岸发动猛烈攻击，“乘虚袭入”津市。

唐荣阳十分恼怒，深知津市失守，澧州便失去倚角之势，如同断了一只臂膀，便火急带上二个团的兵力向津市反扑，只望击溃立足未稳的王育瑛团。可是，这一次他又拔错了算盘，贺龙亲自率精锐部队急趋津市，与王育瑛团夹攻唐荣阳，夺获大炮三尊，机关枪一挺，步枪百余支，其余辎重甚多。逼迫退守澧州城。十二月一日，于下午五时，贺龙统得胜大军，进驻津市。接着，又从临澧、津市两线用兵，围攻澧州。唐荣阳见势不妙，为了保存实力，先将主力撤出澧州城外，留部分兵力在城内，准备在贺部入城时，内外夹攻，使贺龙措手不及。唐荣阳自以为得计，又恰恰中了贺龙的反间计。原来，唐荣阳留守在澧州城内的田鸿钧团早已作了贺龙的内应。况且，贺龙用兵素忌孤军深入，每次攻占总是先肃清外围而后探测前进。所以，澧州便轻而易举的被贺龙占领了。十二月二日，唐荣阳以全部兵力，袭击贺部荣家河驻地，双方激战六小时，唐部不支，已成瓦解之势，向石门溃退。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旬，唐荣阳在贺龙猛烈的追剿下，化名阳荣生，逃亡汉口，宣告彻底倒台。

贺龙进占津市后，市民扶老携幼，纷纷涌上街头，争相观仰他的英姿。贺龙的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津市社会秩序良好，商民照常营业，地方赖以安堵。为了感谢贺龙给地方除了一大祸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津市各界，假座商会，欢筵贺龙。出席筵会的还有川军边防军第一旅旅长张义卿，知事王操如，第七梯团司令王季雄（即王育瑛）第八梯团司令李季玉，第一步兵团团长谷青云等五十余人。

免除苛捐 赈灾救荒

贺龙奇袭津市，进占澧州，赶走了唐荣阳，为熊克武挥师北进立下了很大功劳。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九日，贺龙因转战数省，勋劳卓著，晋升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不久，贺龙以湘军还乡，名正言顺为理由，通电率部返湘。当时省政府主席赵恒惕虽不乐意，也无可奈何，只好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管辖七县。

贺龙出身贫寒，祖上几代受尽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欺压，自从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特别是一九二一年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宣传后，心灵深处希望铲除剥削，推倒人间不平。他深知九澧流域劳苦大众身负各种苛捐杂税的痛苦，进驻澧州后，为了解民倒悬，立即在城乡各地张贴布告，指出：“津、澧多年以来，迭受兵匪蹂躏，商民营业不易，百姓苦不堪言。而镇守此地官吏，每假军需供应，巧立名目，百事苛求。竭民间之膏髓，供无数之奢求。本旅长此次随义军东出讨贼，首在吊民伐罪，尤以搜求民隐，剔除繁苛为职志。凡是久为民间深害，未经政府颁有定章及为财政司署有定案者，均命县属各官吏一律取消。”

唐荣阳任职期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如什么“烟灯捐”、“划船税”、“百货厘金附加税”、“防军柴米价格津贴费”、“渔船税”、“鸟枪税”、“打岩税”等等，有十二种之多，每年抽收的光洋达二十万元以上。老百姓喊他为“唐荣阳万税”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贺龙进占津澧十天后，又张贴了第二份关于取缔苛捐杂税的布告：“鉴于唐荣阳所设各种税十机关，积弊丛生，国家收入日益减少，即令撤销在案，并限收日内一律撤销”。从此，农民负担减轻，商民生意活跃，大大促进了津市市场繁荣。当时，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

和湖北的来凤、咸丰、恩施，以及贵州铜仁等地商贩，为了旅途安全和少缴税金，都弃近路不走，宁可绕道湘西，沿澧水顺下津市，采办和出售各种货物，津市经济贸易，由九澧中心便迅速扩大到川、鄂、黔边区，物资交流更加旺盛。

一九二五年夏秋之交，九澧流域三个月不雨，遭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山区人民靠挖葛采蕨而食，有的连树皮都吃光了；还有不少饥民，背乡离境，形成“流离转徙，饿殍载道”的凄惨景象。

贺龙在追剿唐荣阳残部，占据九澧各县以后，立即回驻津澧，亲自着手进行救灾赈荒工作。首先，他向省政府急电，陈述九澧流域旱情奇重情况；继而通令各县县长同地方绅商，就各该受灾区先行设法救济，以免人民流亡；并选派得力干员多人，分往各县调查灾情。

澧县王家厂有个叫向应轩的大地主，为富不仁，囤积粮食，高价出售。贺龙得知后，带领一部分武装，沿途号召饥民一起去找向应轩借粮，把一仓金黄谷子，发给了饥民，事后他说：“我历来主张宁让一家怨，不使千家愁。见死不救，还带什么兵，打什么仗”？

贺龙从下乡视察回来后，感到灾情之重，前所未有。这年八月二十六日，他主持召开了七县救灾赈荒善后会，到会的有钲署参谋长、秘书长、副官长、军法处长、各县县长、议会议长、津市及各县商会会长等共五十余人。贺龙在会上先后提出六大议案，其中第一案就是“买谷备荒”。他虚心听取代表们意见，决定采取预征田赋、采办粮食、设置大米平糶处等措施，帮助民众度荒，还在津市组织七县筹赈会，筹集银钱和谷米，并预征田赋，进行急赈，同时，电呈省政府察准备案。赵恒惕对贺龙关怀民众，进行救灾赈荒备加赞赏，曾指令云：“

文电阅悉。该镇守使关心民瘼，注意灾荒，设急赈会以救目前，开善后会以维来日，仰即竭力进行，慎始图谋。”

在津市召开筹赈会后，贺龙马上着手预征田赋。为慎重起见，事先张文贴榜，各级召开会议，讲明道理。接着将任务逐一下达，确定大财主预交三年，中财主预交二年，小财主预交一年。对没有谷米的富户，也可以变通折价现洋。然后分别派员下乡督办，规定限期交清，违者严惩。

当时，澧县东路和津市的富户缴纳田赋地点，定在津市元和宫。那些殷实富户，慑于贺龙声威，绝大多数都老老实实按规定，完纳应交正供，不敢拖延使诈。但也有几个冥顽不灵之徒，拉拢行贿，拒不交纳的，受到了严惩。虞家祠堂有个大地主叫虞朝喜，仗着有几百担田的家财和十多枝枪的武装，还有亲戚在省城作官，平时在乡下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当他听说要预交三年田赋时，心中着实不悦，但若与贺龙硬抗，也没有胆量。就想办法拉拢，腐化下乡督办人员。征收田赋的军法官黄载安吃了虞朝喜酒肉，受了礼品后，假报上交数字。贺龙查明后，立即派人捉来黄载安，当众宣布判处了死刑，虞朝喜和其他几个顽抗的地主也被捉来陪斩。有些地主，见势头不妙，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只好见风转舵，乖乖地交纳了应出的田赋。

预征工作顺利地结束了，津市集中了一大批钱粮，贺龙组织人员搭了几个赈饥台，向一些没有劳力的鳏寡孤独，按人口平均散发一定数目的口粮。同时，责令津市商会派人前往滨湖各县采购大批粮食，在市上设立几个发卖处，平糶给平民百姓。

此外，贺龙还大力号召乡民广种杂粮，作好生产自救。九月五日，又作出决议，禁止酿酒熬糖，特出示晓喻，从九月十五日起，无论谷米杂粮，一律禁绝熬酿。

通过上述几项救灾措施以后，灾情很快得到好转，流落在津市的饥民，也纷纷返回了自己的家园。

筹集资金 整顿工厂

一九二二年二月，大庸人熊世钹随部队来津市，与商人金大用等筹办了一个九澧民生工厂。同年九月，因资金告急，人员星散，工厂只好停办。唐荣阳驻防澧水流域时，在九澧民生工厂基础上，选择双济桥（今汪家桥）下首一块地皮，设立一个津市九澧第一贫民工厂。但是，因唐荣阳不理政事，加上行政管理人员贪污渎职，工厂开支甚巨，入不敷出，技师、工人纷纷出走，只好停办。

贺龙目睹工厂困境，决心筹集资金，恢复生产。首先，他组织了一个“津市九澧贫民工厂维持委员会”，选派师部付官长戴佐泉及津市的胡毓楨主持工作。他考虑厂舍码头的更新，机械设备的添置，职员、工人工资的支付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他本人带头解囊，捐助银元四千元，作为开办经费。并以镇署名义，规定三条筹集经费的措施：第一，训令澧县、安乡、南县、临澧、石门、慈利、大庸、桑植、永顺及津市，各摊派银元四千元，共四万元。第二，指令军事检查所所长贺与立将烟土税附加5%，捐拨该厂。凡津澧各土栈的鸦片，必须到九澧贫民工厂完纳税金，加盖印章后才能在市面上出售，否则，加罚税款，甚至予以没收。第三，承续前九澧第一贫民工厂的各项捐款，并在余家台、澧市、新安等地征收河运税。这些税捐全部作为工厂的经常性补助。

在解决经费问题的同时，贺龙指定专人从湖南省高级工校聘请了十多名技师，在各县招收了数十名有专长的技术工人，

从中，选派一部分骨干力量赴上海、汉口等地学习纺织、印染等项技术。不久，聂佐泉派人在津市及周围各县贴榜，招收六百名艺徒进了工厂。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工厂正式开工，省城多家报纸作了专门报道。

不久，维持会改成董事会，由澧县、安乡、南县、临澧、石门、慈利、桑植、大庸、永顺九个县各派三人，津市选派五人组成。董事会召开会议，选举聂佐泉为厂长，胡毓楨为董事长，并特地敦请贺龙为名誉董事长，各董事均具体分工，各负其责。尔后，工厂派出一位董事赴省，办理立案手续。省建设厅予以认可，决定每年拨给工厂津贴费银元七千二百元。

工厂开工后，经济效益很快就显示出来了，产品有九十多种，价格便宜质量好，不久就打入了本地及澧水流域各县工商业市场。

九澧平民工厂整顿、恢复、扩建后取得的巨大成效，使贺龙很振奋。一九二五年十月六日，他通令所属各县县长会同各县士绅，参照津市建厂办法，广设平民工厂，以便收纳一般贫民入厂，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通令发出后，各县大都按津市九澧平民工厂办法，设立了本县的平民工厂。

津市九澧平民工厂先后经历二十一年之久，不仅因创办早、规模大，名布三湘四水，更重要的是，为本地及澧水流域各县，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织布、织袜、制履、印刷、缝纫等技术人才。

天下为公 广施德政

贺龙在津市，住在富商张思泉家（现解放路正街），闲暇时，经常练习毛笔字，写得最多的是“天下为公”四个字。他

将这四个字贴在卧室里，作为座右铭，告诫自己不要谋私利，多为民众生活和社会公益事业着想。

津市是富庶的，但也有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弊端——金融混乱。一九一七年，澧县第一任镇守使王正雅联络本地豪绅集资办起了津市商钱局，发行“制钱一串”票面纸币，流通市面及九澧一带。后来，商家们发现了这个生财之道，于是，“大丰”、“成银”、“六六”等行相继问世。有的商店没有准备金，也滥发纸币，充斥于市，乘机渔利。到头来，市民手里的钱票，往往是一文不值的废纸。长沙《大公报》在一九二五年，曾刊登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津市感受市票之影响，商店倒闭二十余家。受害群众和商民手持滥发的纸票，前往兑现，络绎不绝。但兑到者无几，空回哭吵者不知多少”；当时，对于市票的整顿，津市曾迭次举行，不独未收效果，反整顿一次，而恶货币增加一次。在唐荣阳镇守使时，纸币紊乱，达到极点。

津市的经济对于澧水流域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贺龙在七县善后会上，对津市及所管各县的金融混乱，提出了整顿意见：一、对于九澧纸币，一律限两月内取缔就绪。二、今后凡发行纸币，其准备金有一万元者，可发行纸币五千串，还必须有三家联保，呈报商会注册盖章，再转呈钲署备案，否则不准流通。三、关于纸币的印刷，统一规定只能在津市某石印局专印，倘在他处印刷者，或私造木板图章发行之纸币，一经查觉，当严厉处罚。贺龙提出的这三点意见，态度鲜明，措施具体，行之有效。对一些投机商人是致命的打击，对从事正当经营的工商业者是可靠的保障，平民百姓也不用担心受骗了。

津市的富庶与繁荣，主要是水运发达所致。如果津市与湘

鄂临近各县，陆路运输能妥善解决，津市将更为发达。一九二四年七月，唐荣阳也曾煞有介事的召开会议，讨论修筑常津路、津沙路、澧津路、堵津路等等。但是，他向各县摊派资金共五十万元，兴师动众地设置了一大批执事人员后，时隔三个多月，才在津市财神殿挂出了一个“工程处”招牌，结果以耗资数万之多，劳民伤财而告终。

贺龙任职以后，对津市及九澧一带公路的修筑也很重视，他讲究实效，采取逐段修筑方法。先由澧县至津市公路修起，初步试办，将来渐次推广。他不向各县摊派资金，而将修筑的任务，预备由所属工兵营专门担负起来。两个镇守使对修筑公路的态度和作法截然不同，贺龙对民众的一片赤诚之心，由此可见一般。

贺龙以“天下为公”为己任，采取的一系列德政措施，扭转了澧水流域各县的灾情，安定了民心，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在短时期内使津澧一带呈现出“士勤学业、农耘田畴、商供有无、工专制作的兴旺局面。遗憾的是，因为反动军阀赵恒惕不久兴兵进犯澧州，使贺龙“天下为公”、“广施德政”的很多办法，没有能够完全付诸实现。

声援“五卅” 不畏强权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到处开展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省府赵恒惕惟恐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危及他的统治地位，采取了对抗态度。贺龙则不然，他打电报声援上海、长沙的“三罢”斗争，希望他们坚持到底。又致电驻省办事处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在长沙中国银行拨款捐助三千元，以

资救济”。当长沙“雪耻会”的代表来澧州活动时，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召开欢迎大会，请该会代表在大会上报告各地救国情形。

在贺龙的带动下，津市的爱国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津市各界组织成立了‘津市雪耻会’，决定二十三日起全市实行罢工、罢市、罢课五天”。七月，津市旅外学生朱务敏、周文定、贺玉波等人暑假回津，组织了一个“津市旅外学生会”，并联系各界成立了“津市对英、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开展对英日经济绝交活动。当时，津市市场几乎被英日的货物垄断了，为了提倡国货，津市九澧平民工厂将生产的土布、细布、袜子、毛巾、皮箱等数十种产品在工厂里展销，大张旗鼓的在街上流动出售。工人、学生、店员自动组织起来，挨家挨户到各商店清查“洋货”。人们在福兴绸庄查出日货一批，处以罚款。在万寿宫后坪还当众焚烧了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存在津市的一大批煤油和其他洋货。不久，津市又发生了一起“戴生昌”轮船事件，直接遏止了日商在津的经济扩张。日本驻长领事馆藉此蓄意寻衅，把罪名推在贺龙头上，并向贺龙施加压力，企图扑灭津市爱国群众燃起的熊熊反帝烈火。

“戴生昌”轮船公司，是日本商人在湖南境内经营的客、货综合公司，拥有多支客轮和货轮。“五卅”惨案发生后，津市各界爱国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劝导旅客不坐“戴生昌”的船，说服商人、码头工人不给“戴生昌”装卸货物。后来，各界又进一步联合起来，成立了有六条轮船组成的“六轮公司”，装客载货，这样一来“戴生昌”客、货轮生意萧条，亏本甚巨，被迫一度熄火停航。日本领事馆硬说这是驻津市军事最高机关刘超雄团长，命令该地各商号造成的，并把违反“通

商条约”，没有保护外侨的罪名，强行加在贺龙头上。赵恒惕这类军阀在帝国主义面前向来是唯命是从，甘当洋犬的，立即给贺龙发下一道“训令”，命令他迅速查处。贺龙接到“训令”后，义正词严地给赵恒惕复了一封电报，据理驳斥了日本领事馆的谬论。他说：“津市自从‘五卅’惨案发生以来，人民激于义愤，没有不提倡国货运动的。他们自己凑资，成立‘六轮公司’，在自己的国土上，水域中装客运货有何不可？这是一种自觉的爱国行为，无可非议，理应赞颂。搭客运货完全是人们的自由，我和刘超雄团长也未强加干涉。……日本领事馆之所以这样作，无非仰仗军力以压商民，实系节外生枝，无理取闹。赵省长位尊权大，对该日商‘戴生昌’肆无忌惮的挑衅，应该严词斥责，才能维护国威。”

贺龙的复电，仗义执言，掷地有声，驳得赵恒惕哑口无言，使之恼羞成怒，大骂贺龙无法无天。但是，津市人民得知后，对贺龙不畏强权的行为非常钦佩，深受鼓舞。

维持治安 严肃军纪

贺龙自川返湘时，部队由原来的三个团，通过沿途收编，招募新兵，不久就扩大四倍多，有了十三个团的兵力。但是，新兵多，实力少，打仗不行；有的旧部队成份复杂，军纪不好，给部队的战斗力和地方治安、军民关系都会带来一些问题。为此，贺龙一方面增设新兵训练处，开办军官教导团（后改为军官教育团），训练一支具有军事素质的部队。另一方面，以铁的纪律对没有战斗力的部队，予以整编；对骚扰百姓，不听指挥的部队，予以缴械或遣散；对违反军风纪，危害社会治安的军人，予以严厉制裁。